



这样的故事 最中国

张军 著

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个犯不起错误的国家。也因为这个约束条件，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持续的变革和创新来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因而，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总是可以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作出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
最中国

张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样的故事最中国/张军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
ISBN 978-7-5426-3549-5

I. ①这… II. ①张… III. ①经济—中国—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9172 号

这样的故事最中国

著 者 / 张 军

策 划 / 戴 俊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特约校对 / 张向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60 千字

印 张 / 2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549-5/F·587

定 价 / 48.00 元

张军给我上了一课

张五常

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颇长的评论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文章，写得好。不是因为他赞赏拙作而说写得好；老人家对赞的弹的早如过眼烟云也。说张军的文章写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经济增长思维与行内的经济增长学说互相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一丝关联。我没有跟进他家之说多年了，张军给我上了一课。

在经济增长这门学问上，张军比我晚了两辈，恍若隔世。我读的经济增长论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当年认为一律不妥，但选修了这门学问，考博士试要背得出来。我是一九六三年考这科目的博士笔试的，之后再没有染指，虽然在《佃农理论》的第一个附录中我禁不住手起刀落。张军读的经济增长学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晚了整整四十年。他提到的“增长决定学”的首要人物，是我认识的 Robert Barro。认识，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与此君进晚餐时，我问：“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时，有一位很聪明的同学名为 Steve Barro，你认识吗？”Robert 回应：“是我的哥哥！”地球是小的。我再问：“七十年代在西雅图华大，有一个叫 Barro 的造访，是你吗？”答曰：“是。”

我没有跟进 Robert 的学问，但知道他早就成了名。年多前金融危机出现后，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好些评论，跟凯恩斯学派过不去，读来过瘾。我可没有跟进过张军显然重视的“增长决定学”。上文说过，一九六三年博士试后，我再没有染指他家的

经济增长学说。我知道六十年代后期起麻省理工的经济学派搞起了另一套经济增长学,主要的骨干是生产函数加上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后者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佛利民在生时常说他的《价格理论》最后的关于财富累积那一章,他自己格外满意,但注意的人甚少。财富累积是重要话题,我曾经像佛老当年,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入手,所获不多。年多来得到金融危机与中国房地产的启发,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只是人老了,想想无妨,说说无妨,但要坐下来大兴土木,则没有魄力了。

新角度有两个相关点。其一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那些所谓“毒资产”只是一些纸张,写着的财富下降至零什么也没有。如果财富的累积是房地产,其价暴跌资产还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机会存在,不会出现绝望之境。股票财富的暴跌差一点,但有关机构一日存在,股民还是有机会收复失地。用没有抵押或抵押远为不足的纸张来累积财富,说是先进的金融制度,是愚蠢的选择,虽然时来运到可以赚很多钱。

第二点,有关的,是这些年北京屡次要打压楼市。我明白他们的目的,但在经济增长得好的中国,一般市民要通过投资来累积财富,最安全的可能是在房地产上打主意。不容许他们这样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无意间令房地产的投资者损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极端的例子,说打压楼市可以把整个经济搞跨。中国面对的房地产政策是大难题。我曾经指出国家的人口要怎样分布,楼价的约束差不多是唯一的可靠策略。香港的经验不支持廉租房,廉价房较为可取,但不易处理。不反对协助那些居无定所的穷人,但香港在二战后有如下的经验:一些穷人喜欢买楼,做生做死也要买,先买很差的,然后逐步捱上去;另一些怎样也不买,天天投诉,见到楼价上升就破口大骂。前者今天不少发达了,后者今天住廉租屋或公屋。原则上,所有的人可以一起从穷日子开始买房子,跟着国家的增长以房子作为财富累积而一起富裕起来。困难是中国增长得快,收入的增长不均,对房子投资的想法不同,出现了今天的情况。

这就带来以生产函数分析经济增长的困难,也有两点。其一是没有上佳的财富累积理论的支持,生产函数理论是建在浮沙上的。其二是把生产要素放进函数,制度不对头产出会失灵。六十年代初期我研究生产函数时,人民公社在神州当道,饥荒遍野的消息源源不绝,由我的两位姊姊传到香港的母亲传到我那边。也是那时,老师艾智仁的课强调产权对产出的重要,而我拜读高斯一九六〇的大作始于一九六二,反复地读了三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来自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到北京推销生产函数,我写《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时,只字不提这函数。其实生产函数这门

学问北京早就从苏联进口了，我提出的产权及交易费用对他们有新意。

我是懂得生产函数分析的，曾经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数很搞笑。异曲同工，史德拉的《价格理论》的初版有如下一题：“玛丽说：「你给我钱我也不吃橄榄。」试绘玛丽的等优曲线。”此妙题后来史老兄尴尬地取消了。（我知道答案，同学猜得中吗？）

分析经济增长，多年以来我只着重两点：一、资源的局限；二、竞争的制度。这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增长学说兴起之前的老生常谈，从古典的史密斯到新古典的马歇尔都那样看。经济的增长由竞争制度带来的资源使用决定，亦老生常谈。我的贡献，是得到艾智仁及高斯的启发后，把制度分析改进了。改进的重点是把产权约束竞争逐步发展为以合约约束竞争；把交易费用推广为社会费用，再转一下角度，看为约束竞争的费用；把租值消散与社会费用挂钩，而制度增加效率则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来是头痛万分的财富累积一下子简单起来，因为可从资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带来的资源价值上升就是财富累积了。

财富累积的分析，从利息理论的通道发展很难走，从资源租值变动的通道推进顺利得多。不幸，后者可能遇上租值分配的问题，正如今天中国遇到的。这问题牵涉到价值观，难有科学答案。

不容易达到自己今天的经济增长观。从《佃农理论》到《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四十年，我走的路没有变。基本上是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修改了好些地方，加进了他们没有考虑的局限变化，但通道是他们打开的。费了不少心力，一点一滴地改进，走了很远，但还是那条路。今天得到张军的提点，发觉自己站着的位置与行内盛行的“增长决定学”有那么大的分离，不知何解，也有无限的感慨。

高斯曾经说，无论一个理论怎样了得，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错，或会被较佳的理论替代。这看法不是高斯独有——科学思想史满是这样的观点。搞思想不是争取永远地对，而是争取有深度的启发力，然后望上苍保佑，写下来的可以经得起一段漫长时日的蹂躏。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4月4日

代序

张军给我上了一课(张五常) / I

第一部分

再问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成功? / 3

“为增长而竞争”的意义 / 13

为什么国家能力的建设很重要? / 20

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 24

把谁的激励搞对? / 27

思想的冲击:张五常巧解中国的经济
制度 / 31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 38

为《为增长而竞争》而写 / 43

转型的使命——为陈钊序 / 57

走向前沿——读钱颖一新著《现代经济学
与中国经济改革》 / 61

中国的政治是个优质资产 / 66

增长的困局 / 68

增长的理由 / 71

迷失在亚洲增长 / 74

我又想起了熊彼特…… / 77

为了和谐: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治
理? / 80

大江东去,浪淘尽:中国人世五周年告诉了
我们什么? / 84

中国人世给经济学家的教训 / 87

第二部分

- 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另类的吗? / 91
再说印度增长 / 95
印度和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 97
闹猛的中印竞赛 / 101
中国和印度相互看齐什么? / 104
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是必然的吗? / 106

第三部分

-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中的消费因素? / 111
我们真的相信国内消费不足吗? / 113
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 118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储蓄这么多? / 124
无知的增长 / 127
该压什么样的投资? / 130
治理危机还是统计危机? / 133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 136
把账算清也是不错的研究 / 139
改革越来越技术了 / 143
增长的分歧 / 146
麻烦的分配政策 / 149
再分配政策可以抬起消费物价 / 153

第四部分

- 苏南现象:财富是交换出来的! / 159
“草根”为何成大器? / 162
这样的故事最中国 / 165
为什么说产权比财富更重要? / 169
真实的 GDP,真实的产权:读梭图的《资本之谜》 / 172

垃圾经济的“神话”?	/ 175
小议创新与创新型国家	/ 178
创新就是改变以往成功的想法	/ 183
创业与教育	/ 185
服务业不发达的苏联因素	/ 187
生煎馒头为什么做不大?	/ 190
假冒伪劣为什么那么猖獗?	/ 192
高房价是被识别出来的	/ 195
“国有制”的喜宴	/ 197
怎么才算国家富强?	/ 200
建设上海有多重要?	/ 202
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 204
拿还是不拿高薪,这不是一个问题	/ 207
为什么要成为“中心”?	/ 210

第五部分

我们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例外吗?	/ 215
全球危机改变了中国?	/ 219
金融海啸如何影响美国和中国?	/ 222
金融危机了,思想不能危机	/ 225
两种类型的经济下降	/ 227
中国经济为什么可能率先复苏了?	/ 230
该怎么理解流动性过剩?	/ 234
容易的货币不容易花	/ 237
是什么制造了中国的宏观现象?	/ 239
中国的宏观繁荣为何与贸易顺差并存?	/ 244
中国会告别低利率时代吗?	/ 246
为 8%简单算笔账	/ 249
聪明的政府、吵闹的经济学家	/ 252
关注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 255

第六部分

- “招商引资”的由来 / 261
- “深圳特区”为什么会遭遇那么多的批评? / 266
- 特区与中国沿海开放战略: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 270
- “莫干山”上的价格论战 / 274
- “巴山轮会议” / 278
- 涨价的追问与追忆 / 283
- 通货膨胀是怎么离去的? / 288
- 中国早期通货膨胀的理论贡献 / 291
- 对双轨过渡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 295
- 1994年的分税制 / 299
- “光荣革命”(1):国有企业的激进改革 / 303
- “光荣革命”(2):“包”起来的国有企业 / 307
- “光荣革命”(3):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 / 310
- “光荣革命”(4):新型国有企业的成长 / 314

第七部分

- 中国还在你身边 / 321
- 增长的故事(1) / 324
- 增长的故事(2) / 326
- 增长的故事(3) / 328
- 价格死了,价格万岁 / 331
- 收入是重要的 / 334
- 为什么人的行为是可解释的? / 337
- 谁是企业家? / 340
-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老板的 / 342
- 观奥运的闲言碎语 / 345

后 记 / 348

第一部分

再问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成功？

“为增长而竞争”的意义

为什么国家能力的建设很重要？

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把谁的激励搞对？

思想的冲击：张五常巧解中国的经济制度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为《为增长而竞争》而写

转型的使命——为陈钊序

走向前沿——读钱颖一著《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的政治是个优质资产

增长的困局

增长的理由

迷失在亚洲增长

我又想起了熊彼特……

为了和谐：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治理？

大江东去，浪淘尽：中国入世五周年告诉了我们什么？

中国入世给经济学家的教训

再问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成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府一直在实施着改革，之前是在努力改革成为更加公平的计划经济，之后则是追求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日常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暗含了市场化的取向。这样来定义的话，中国的改革其实最早是从1972年开始的。中美建交后，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决定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机器，进口机器其实本身也没什么，关键的区别是，这些进口的项目中，有一半是去了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由于其自身特有的地理和资源禀赋条件，更加适合于发展工业经济，因而这实际上暗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从追求平等转到效率。而1950年代的重工业化和19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都是将重点放在内陆地区，沿海很少获得上级政府的资助，中央政府有意去提高内陆地区的经济水平，即使这种公平是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效率损失。

现在都认为中国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而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变革则来自于这个时候很多自发性的制度的出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的特区的建立等等。但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都只能算是一种自发演进的和自下而上的改变而已，而不能认为是政府有计划的改革策略。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了，后来只要经济出现波动，在很多地方就开始出现这种模式，最终在1980年代初期，政府意识到这种模式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农村的资源，因而在法律上给予正式的许可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广。有很多研究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城乡差距唯一一次的缩小，都跟这个自发的制度试验有关。

今天看来,特区是中国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但是回想起来,特区的出现却跟当时在广东保安县的逃港事件有关。当时整个广东地区有很多人越过香港和大陆的边界,跑到对面去,因为到香港打工再回到广东,那就是当地的富翁了,后来当地政府实在没办法,就与中央政府进行商量,与其人跑过去,还不如让对方的资金跑过来,于是袁庚先生向中央政府建议在蛇口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小圈,引进香港的资本,搞个特区。后来这个圈越画越大了,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诞生。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其资金的使用成本低,税收是三年两减半,土地的租金也很低,于是资本就过来了,并且可以利用当地和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因为税基突然之间扩大很多,当地政府都尝到了甜头,于是很多其他省份也要求建立特区或者开放,开放进一步向其他省份拓展。特区的建立也是政府不得已而为之,事先并不是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发展,后来各地出现的经济开发区等形式也仅仅是特区的一种演化,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

不仅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特区是自下而上的,曾经饱受争议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如此。在70年代之前,各地就出现了大批的小型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不在国家的计划内,因而必须允许其拥有相对独立的价格体系,“文革”中更是如此,整个计划体系的崩溃使得各地不得不依赖于黑市交易,以此来保证当地生产的投入,因而80年代的双轨制也仅仅是将之前就形成的计划外与计划内的混合体制合法化而已。

双轨制被认为是整个80年代改革的特色。如果仅仅站在80年代末期来看,双轨制对于产品市场的开放是有作用的,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生产资料的领域,双轨制带来的是更多的经济混乱和官员腐败。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双轨制的存在是中国跟东欧国家改革差异的原因,因为东欧、包括当时的苏联都是采取世界银行所建议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价格自由化,这种改革模式往往会是两种结果,要么很好,比如玻利维亚;要么很坏,比如俄罗斯和波兰,后者第二天发现商场没有东西了,货架上全是空的,于是混乱出现了,军队也开始不稳定了。

双轨制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在于盘活了资源,企业在边际上是有生产动机的。对国有企业而言,计划内的生产可以看成是一种上交给国家的固定税,而计划外的生产则完全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双轨制创造的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机制,从原材料到产成品,非国有企业面临的的是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轨制缓和了改革初期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双轨制带

来的坏处可能要大于好处，双轨制在中国导致了经济混乱和腐败猖獗、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引发了1989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

经过1989—1991年的徘徊后，1992年的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以及1993年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者坚定了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不是倒退到以前的计划经济，同时也否认了80年代的改革模式，之后有一系列的改革紧随其后，包括1993年的价格自由化；银行体系改革和贷款负责制；贸易、汇率的改革；分税制取代财政包干；取消福利分房；1996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我们发现，整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是中央政府有意识的制度安排，同时很多80年代无法推行的改革，到了90年代都顺利地得到贯彻。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在90年代中迅速成型。的确，从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来看，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相当成功的。那为何90年代能够完全扭转80年代的改革模式？相比80年代，90年代发生了什么？

随着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陷入滞胀的衰退期，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被许多学者、专家、机构质疑，它所造成的政府失灵现象为世人所诟病，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限制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作用在1980年代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大市场、小政府”的思想逐渐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该背景下出台的，它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机构对政府失灵的一个政策解决方案。拉美是实践华盛顿共识方针最彻底的地区，相似的改革也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方。在实行华盛顿共识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这些国家应当会有显著的经济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接受“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教条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维持了基本的增长速度，大部分拉美国家反而陷入了贫困和政治混乱交织的陷阱。

中国经济的表现使很多人认为是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典范，但我们却看到，中国整个90年代的改革是相当激进的。比如1993年实行的价格自由化获得了成功，而同样的改革也曾在1988年推行过，后来由于过高的通货膨胀而不得不放弃。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8年左右，中国是处在极度通货膨胀阶段，当时有个词语叫“消费基金膨胀”，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买的太多了，供不应求了，价格就开始涨，于是钱不值钱，通货膨胀就出现了（现在的中国则相反，大家都不消费了，或者是消费不起了）。我这里不会去分析为何当时消费会膨胀，那会是另外一个大问题，我只想说明白中国经济在80和90年代宏观表现上的差异。在80年代如此高的通货膨胀条件下，如果实行价格自由化，会更进一步增加整个社会的需求，于是情况会变得更糟，通货膨胀会更严重，当

通货膨胀严重到不能忍受的时候，社会就开始动荡了。而 90 年代，特别是 1993 年前后，中国基本根治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供给获得根本性的突破，形成了产能过剩的基本状态。因而到了 1993 年，中国实际是通货紧缩的，在通货紧缩的时候，放开价格就不会有大问题，即使大家出于对未来市场的恐慌去购买，也不会使得物价上升很多，因而价格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价格改革应该是整个 1990 年代改革中最重要的，这是因为要使市场发挥作用，价格必须反映其稀缺程度，这样才能不浪费资源，达到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当市场是扭曲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时，价格是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于是那些宝贵的资源被利用到那些不很重要的用途上，甚至是浪费掉了。这样，价格改革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银行业的改革也是在 1990 年代开展的，主要是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商业银行体系，从此，银行将以盈利作为主要目的，这样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之不能轻易地从银行得到资金，以维持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同时将以前的贷款审批制改为贷款的负责制，这样每一笔贷款都有负责人，减少了银行自身的坏账和呆账。

价格改革和银行业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压缩了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由于失去了价格保护，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相比非国有企业而言要低，而其原材料也要以市场价格进行购买，因而面对非国有企业的高效率生产，国有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同时银行业的改革也硬化了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想要从银行获得贷款来维持经营也越来越难。另外，各地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因而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样地方政府也没有继续保护国有企业的动机，于是在 1990 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对外贸易的改革也更加强调自由化，进出口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中国更加积极地加入 WTO，更加积极地鼓励 FDI 的流入。这样看来，90 年代的改革，包括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硬化财政约束、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加强对于产权的保护等等，都是朝着华盛顿共识迈进了，简单将两者进行对比，发现除了利率和汇率之外，中国基本上是实行了华盛顿共识中的方案。并且从今天的改革成就来看，这一方案在中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1990 年代改革的成功，在经济上表现为高增长、低通胀，同时投资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高，外贸依存度越来越大，中国更加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资本的积

累速度加快,使得人均所拥有的资本量迅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并不是粗放式的,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学上以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示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该指标在1987—1991年基本是水平的,这说明这些特殊的年份是没有技术进步的,而从1992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是呈显著的线性增长模式,表明90年代的经济增长质量与80年代是有本质差异的,前者更像是粗放型的增长,而后者更像是技术进步带来的集约型增长,并且从1992年开始,技术进步的波动也逐渐收敛于一条水平线,即不会再像80年代那样出现经济增长的忽高忽低,因而90年代的经济是一种更稳健的、高质量的增长模式。

改革模式的差异在其他经济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比如,我们现在熟知的外贸顺差也仅仅是从1994年才正式开始的,而之前不仅外贸的数量很小,顺差和逆差也是经常交替出现,仅仅是从1994年开始,外贸顺差一直存在并且逐渐扩大,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更加自由的市场化体系也给那些更具潜力的地区以更多的发展机会,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从90年代中期开始,那些初始条件更好的地区的增长速度更快,这虽然表明整体的效率在提高,但也预示着地区差距在扩大,我们也观察到,从90年代初期以来,内地与沿海地区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一直是扩大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还在于制造业,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同期农村地区由于改革的滞后,仅仅作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因而我们看到城乡差距唯一的一次缩小是在80年代中期之前。

中国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成功,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解释,横向上,同样的市场化改革也曾经在东欧国家和苏联推行过,但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今天还以激进化的改革作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但是同样的改革在中国却取得了成功,这是需要解释的。中国与东欧国家到底有什么不同?纵向上,80年代也曾经试图实施市场化的改革,但后来的结果显示行不通,并且这种改革反而带来了更进一步的混乱,而到了90年代,同样的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纵向上,90年代的中国与80年代的中国到底又有什么不同?

东欧国家和苏联与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两者都是以重工业化为主的计划经济,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几乎没有私有经济等等。但是两者也不完全相同,中国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而相对而言,其他国家的资本更多,因而重工业化的战略给中国造成的扭曲更大,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资本相对较贵,资本密集型的